

探求失落的心靈空間

謝柏暉*

書名：*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作者：Robert Darnton

出版時地：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頁次：xiii + 298 pp.

人酷似其時代，猶勝酷似其父

——阿拉伯格言

前言

Robert Darnton 這本著名的《貓的大屠殺》從 1984 年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個年頭。雖然有人可能會認為現在才寫這本書的評論已經有些過時，但縱觀台灣學界二十年來，僅有兩篇文章對此書有過較詳細的介紹和討論，¹顯示這本在歐美學界激起一片批判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¹ 這兩篇文章為：潘宗德，〈Review of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歷史：理論與文化》（參見網址 <http://htc.emandy.idv.tw/newsletters/001/article05.html/>）；余芳珍，〈從 Robert Darnton 之“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談新文化史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取徑〉，《政大史粹》，4

和反省聲浪的著作過去並未獲得學界應有的重視。而就此兩篇文章來說，評者以為，均有未能曲盡此書意涵之處，且未能對此書進行完整且深入的討論。

因此，評者寫作本文的目的，便是企圖較為詳盡且深入的評介此書。由於本書在心態史的研究取徑以及人類學方法在歷史研究的應用上，都是具有指標意義的重要著作，因此，在西方新文化史影響力逐步東漸的現代，此書對中文世界有志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可說是不可不了解的一部作品。且此書的方法，諸如象徵人類學的心態史操作手法、文本的詮釋等等，在在都有值得借鑒之處。故評者不揣淺陋，試撰此文，希望針對本書的討論能對新文化史的瞭解有所貢獻及啟發。

所謂「心態史」，依 Robert Mandrou 的定義，是集體世界觀的歷史（a history of visions of the world），²也就是過去的人們如何思考、解釋（construe）世界，並賦予其意義及情感的歷史。³它關注的是一般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以及對事件的理解，而非分析事件本身。⁴本書在研究的取徑上與法國的心態史著作如 Aries 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研究是採用人類學的取徑，而非法國心態史的量化統計方法。

作者 Robert Darnton 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人類學家 Clifford

（2005.7），頁 147。

² Michelle Vovelle,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Chicago, 1990), pp. 5.

³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VINTAGE, 1985), pp. 3.

⁴ Robert Darnton,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收錄於氏著: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ORTON, 1990), pp. 257.

Geertz 共事的經驗使他採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集體心態，他認為 18 世紀法國人的心靈空間（mental universe）對現代歷史學者來說就像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或印尼人的心靈空間之於人類學家一般是難以穿透的。因此，若將 18 世紀的法國人的思考方式當作和現代的法國人一樣，將會犯時代錯置（anachronism）的謬誤。⁵例如對現代人來說，色情小說（pornography）和哲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即使要說兩者之間有任何關連都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但 18 世紀的法國人並不會將色情小說、哲學或反教會的著作加以區分，⁶色情書籍作為一種圖書的分類是 19 世紀的事情。⁷所以，研究過去的人如何思考、行動，應將文本中的行動者與文本的書寫者當作是被侷限在過去的人所建構的意義之網（system of meanings）中，即便是想像和幻想也無法突破此一侷限。例如 18 世紀法國極為暢銷的一本禁書 *L'An 2440*（公元 2440 年），描述 1740 年的作者一覺醒來後發現自己置身於 700 年後的巴黎。這本書看似科幻小說的幻想，但書中的情節和現代人對科幻小說的印象十分不同，並沒有任何讓人眼花撩亂的進步科技。2440 年的法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顯然受到 18 世紀 Quesnay 重農主義學說的影響），實行一種有限君權的公眾平等主義政治（受到 Montesquieu 影響），沒有教會，只有對神的虔誠（受到 Deism 影響），教育主要是要激發 civic virtue（受 Rousseau 影響）。⁸這樣的

⁵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4.

⁶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1991), pp. 81.

⁷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Harper Collins, 1996), pp. 87.

⁸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chapter 3.

⁸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chapter 4.

敘述很明顯的仍是根植於 18 世紀的脈絡之中，可見其作者難以超越時代的侷限。而這樣的一種時代環境的束縛，正是 Robert Darnton 據以探究 18 世紀法國人心靈的外在條件。

二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一書共分六章，由六篇論文組成，分別分析不同體材的文本。在加以評介之前，評者有必要對作者及其學術背景及傳承作一介紹：

Robert Darnton，畢業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專長為心態史、書籍史。於 1960 年代負笈英國，就學於 Richard Cobb 和 Robert Shackleton 兩位教授，前者專研法國大革命，後者則是啟蒙專家。因此 Robert Darnton 注意到啟蒙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連性，致力於對此一關連性的瞭解成為其日後研究生涯最主要的關懷。1960 年代正逢英國馬派史學盛行，英國史家頭一次企圖去瞭解社會整體，特別是下層大眾。這種從庶民 / 邊緣入手研究傾向也影響了 Robert Darnton 日後的研究取徑，如其對 18 世紀法國書籍的研究，不注重知名的啟蒙作家及作品，而著重在被當時法國政府（Old Regime）視為非法的禁書上，⁹結果當時最暢銷的著作並不是對現代人來說最知名的啟蒙代表人物如伏爾泰或狄德羅的作品，而是對一般現代人來說毫無名度的

⁹ 在 1770 年，法國收入較高的工匠和店主已有能力購買書籍並閱讀。例如盧梭的父親，一位製錶匠，就有閱讀的習慣。因此這些禁書嚴格來說並非是菁英的專利。見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71;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27;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69-70.

作家如 Mercier 或 Raynal 等人的作品，¹⁰而其著作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啟蒙理性哲學，而是色情小說，烏托邦幻想或對名人的誹謗。¹¹這就展現出了一個和我們印象中十分不同的啟蒙法國。在心態史的研究方面，Robert Darnton 致力於建立一種人類學式的研究取徑。這種取徑有別於法國心態史的研究。法國心態史的研究受到年鑑學派影響，因而認為所謂的第三階層（the third level），也就是文化，可以用第一階層（the first level，指經濟與人口）與第二階層（the second level，指社會結構）的計量方法來分析。¹²例如分析安魂彌撒舉行的次數或教堂用來崇敬聖人所用的蠟燭的磅數等等。但 Robert Darnton 指出，對這些計量數據所做的分析，其實是史家自己的創造物。歷史書寫的邊界不是統計圖表、經濟模型、電腦列印或社會體系，而是身影模糊大眾的失落心靈。文化產物（cultural object）是過去的人所產出的，具有其意義。它們不應被計量，而應被閱讀。¹³本書即是 Robert Darnton 心態史研究的成果，透過人類學的方法對文本進行詮釋，呈現一種非傳統（unconventional）的法國文化史。

三

《貓的大屠殺》一書是 Robert Darnton 心態史研究的成果，也

¹⁰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63.

¹¹ 這只是文本表面上的形式，如色情小說可以是無神論的唯物哲學，而烏托邦幻想也是對 18 世紀現實的批判。參見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其中第三、四、五章。

¹²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收錄於氏著：*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 (Polity Press, 1988), pp. 95.

¹³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58.

是他受到 Geertz 人類學影響的研究的實作。¹⁴以下即就每一章的內容加以簡介並評述。

第一章：Peasants Tell Tales: The Meaning of Mother Goose

（農民說故事：童話故事集「鵝媽媽」的意義）

在本章中，作者所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呈現歐洲童話故事的原始型態。這些著名的童話故事，如睡美人、小紅帽或藍鬍子城堡的原始型態和今日一般人所認知的有相當大的不同，如睡美人在童話故事集鵝媽媽（Mother Goose）中的原始版本，是已婚的王子強暴了沈睡中的公主，而公主在沈睡的狀態之下生了好幾個孩子，而孩子在哺乳時咬醒了公主，破解了魔咒。而小紅帽的故事則是大野狼先將老祖母殺害分屍之後再假裝成老祖母然後吃掉小紅帽。像這樣的故事內容顯然和現今定義的童話故事相距甚遠，因為這些故事的原始起源或多或少是 18 世紀法國農民在小屋中度過漫長冬夜時所說的爐邊故事，諸如此類的 18 世紀法國農民故事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便是作者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

湯姆拇指（Tom Thumb）的故事情節相當於法國版的糖果屋，描述一對居住在森林中的貧窮夫婦育有 7 個兒子，這些兒子對他們的生活造成負擔，因為其中尚無人可以自食其力。當飢荒的威脅來臨之際，這對夫婦決定要除掉他們的孩子。於是他們將孩子遺棄在森林之中以圖自身的生存。而在「魔法師的學徒」（Sorcerer's Apprentice）的故事中，父親將兒子賣給魔法師（在某些版本中是魔鬼）當學徒以換取 12 年的食物儲存。像這一類故事以情節大致相同的架構存在於多種版本的農民說故事的文化之

¹⁴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i-vi.

中，反映了農民生活的若干面向，諸如人口的壓力和殺嬰的普遍，以及隨時受到飢荒威脅的生活。另外，如「穿長靴的貓」（Puss'n Boots）和「雌狐」（La Renarde）的故事則是表現出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對其他兒子所造成的壓力及潛在的焦慮。因此，農民的故事中雖然有幻想的成分，但仍是根植於真實世界之中的。

Robert Darnton 在本章中所要處理的另一個問題是透過比較童話故事在各國版本中因素的不同來歸納出法國版本童話中共有的特殊因素，也就是法國性。許多版本的童話故事基本架構都是相同的，但在各國的版本中故事的風格卻差異甚大。在諸多故之中，法國版的故事顯示欺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十分有效的。在童話故事中，好的行為不必然導致好的下場，而不道德的行為卻是必要的生存方式，¹⁵在現實世界中亦然。Robert Darnton 指出，欺騙策略（tricksterism）是法國版本的童話故事的共同因素，它提供一種在殘酷的現實社會中生存的方法。而故事中這樣的特性已經被法國的文化所吸納而成為法國特有的概念意象、諺語與風格，而這也就是法國性。¹⁶

第二章：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工人反叛：貓的大屠殺）

由 Robert Darnton 將本章章名訂為書名，可看出他對此一文本的重視。此文本是一個印刷工人的回憶，主要在描述 1730 年代在巴黎的一個印刷作坊（workshop）所發生的學徒（apprentices）和

¹⁵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54.

¹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61.

職工 (journeymen) 將貓集體屠殺的故事。文本中提到由於學徒們深為貓叫春聲 (caterwaul) 所擾而不得安眠，為解決此一問題，由一位具有模仿聲音天分的學徒趁晚上偷偷爬到作坊主人 (master) 夫婦的房間附近的屋頂上學貓叫。在連續幾個晚上的失眠之後，主人夫婦決定對貓採取行動，他們命令工人們把這些貓除掉。長期為貓所苦的學徒們這下子終於有機會光明正大地對這些貓展開報復行動，他們以鐵棒和掃把柄將這些貓打死或打到半死，並透過有計畫的布置布袋，將所有的貓一網打盡。而他們還將半死的貓以戲謔式地模仿法庭審判 (mock trial) 的方式在宣布有罪之後絞死。¹⁷ 這樣一種情節對現代人來說一點也不有趣，甚至令人反感。¹⁸ 但對 18 世紀的印刷工人來說，這樣的行為自然有其意義，茲陳述如下：

首先，是工人們殺貓的行為作為對中產階級作坊主人的象徵性反抗。由於貓當時似乎是在印刷業，至少是在作坊主人 (master) 的階級中受到喜愛的動物，例如有一個作坊主人養了 25 隻貓，請人為牠們畫肖像，並餵牠們吃烤雞。¹⁹ 雖然工人們殺貓的行動是在主人的授意之下進行的，但女主人在殺貓行動開始之前曾明確的要求工人不得傷害她最喜愛的一隻貓—小灰 (la grise)。而工人們殺貓的行動一開始就是將小灰當作第一個開刀的對象，這樣的行為令女主人感受到工人們反叛的威脅，但又無可奈何。而工人們之所以企圖反抗作坊主人，則是和當時印刷業的大環境有關。

¹⁷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76-77.

¹⁸ Robert Darnton 對文本中人類特異的行為的關注，應是受到其老師 Richard Cobb 的影響。見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254.

¹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76.

從 17 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小型的印刷作坊由於不敵政府支持的大型印刷廠而被淘汰。這意味著印刷業的職工（*journeymen*）能夠晉身中產階級主人的機會變少了，再加上作坊主人喜好雇用不合格的短期工人以降低成本，凡此種種都使得作坊主人與工人（職工與學徒）之間關係惡化。此外，作坊主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人們脫節，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工人們的眼中，主人和他的家人令人厭惡，因為他們不必工作，卻能過優裕的生活。工人們心中期望著在印刷業剛出現之時那種主人和工人們一同工作的平等關係。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關係已成為遙不可及的過去。²⁰

再來就是工人們選擇以「殺貓」的行動來作為象徵性的反抗，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貓在前近代的法國被認為和巫術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安茹（Anjou）的人們認為如果貓進入麵包店將會使麵包發不起來，而不列塔尼的人們則認為吸公貓尾巴中的鮮血可使重病痊癒。²¹事實上，貓常被認為是魔鬼或女巫的化身。²²

因此，透過攻擊女主人最心愛的小灰，工人們實際上是在指控女主人為女巫。而嘉年華（*carnival*）中的嘲弄音樂會（*charivari*）的傳統²³更是在文本中暗示女主人和她的神父通姦，²⁴

²⁰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82.

²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4.

²²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2.

²³ 嘲弄音樂會（*charivari*）通常是嘉年華時遊行隊伍以種種不和諧的噪音（*rough music*）來嘲弄戴綠帽的丈夫（*cuckold*）或是娶年輕女孩的老頭的一種行動。因為這些人被認為是違反了社會的規範。見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83;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8; 參見 Peter Burke 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179。

²⁴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6.

並諷刺主人戴綠帽 (cuckold)。²⁵因此，工人們的殺貓行動乃是一種象徵性的反叛。

第三章：A Bourgeois Puts His World in Order: A City as A Text (一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城市作為一個文本)

本章中，Robert Darnton 的目的是透過分析一位佚名的中產階級寫於 1768 年的文本，來探究當時中產階級的世界觀。這份文本是描述法國朗格多克省 (Languedoc) 第三大城 Montpellier 的介紹性文章，類似旅遊指南 (guidebook)。文本的前半部在描述一場遊行，而後半部則是將 Montpellier 視為一個三階層的社會結構。

遊行在前近代的歐洲普遍被視為是重要的事件，像作者所描述 Montpellier 的這場遊行，其目的不是要刺激貿易或觀光，而是一種社會對自身的再現在街上的展現。但我們不可以將遊行的行列當成是當時社會的模型，因為遊行行列誇大了某些因素，同時又忽略了其他。²⁶

文本的第二部分所描述的三個階級，所用的分類架構仍是傳統的教士—貴族—平民三階層的架構。重點是，文本的作者將其內容作了全新的定義。他把教士階級從這個架構中刪除，然後將貴族²⁷移到第一階層，而以中產階級 (Bourgeoisie) 為第二階層。作者這樣做的企圖便是透過改變分類的範疇來容納一個傳統的社會階層無法容納的新興階級，也就是中產階級。作者此處所謂的中產階級，並非馬克思所說的工業資本家，而是無貴族頭銜的政

²⁵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7.

²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22.

²⁷ 依文本作者的說法，Montpellier 並沒有古老的封建貴族。這裡的貴族指的是因擔任高級官員而獲得貴族資格者。

府官員以及公證人、律師、金融業者等專業人士，或無特定專業而靠租金為生者。事實上，工業資本家在 18 世紀的法國人數極少也沒有影響力，當時所謂的中產階級，指的主要是靠收取地產的租金為生，過貴族般的生活（live nobly）的人。²⁸也就是所謂的 bourgeois of Old Regime，而這正是 18 世紀定義的「中產階級」。²⁹在這樣的一種「分類」的過程中，作者事實上將他所屬的中產階級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它支撐第一階級，並依其意志支配第三階級。」這樣的定義和作者對當地經濟秩序的覺察是否正確無關，而是他閱讀社會的方式。正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在文本作者的心中佔居了 Montpellier 社會最核心的位置。

而在作者眼中對中產階級最具威脅性的是第三階級，而非第一階級。雖然第三階級的辛勤工作符合作者對工作價值的重視，但他對第三階級的生活方式，諸如酗酒、好爭吵等等表達極度的不屑。

作者對下階層生活方式的鄙視，在現代人看來，似乎是保守且不理性的。但實際上，作者是相當「啟蒙」的。他鄙視教士，主張宗教寬容，認為凡是為超出理性範疇之外的事物爭辯都是沒有意義的。那麼，作者為何對下階層如此不寬容？事實上，對下層人民的鄙視及不信任，是啟蒙菁英（如伏爾泰等）的一貫傾向，本文的作者也不例外。他們認為啟蒙的知識只能保留給上層菁英，因為一旦大多數人風聞此事，將使政府及基督教失去控制社會的力量而造成社會混亂。³⁰因此，當作者在限定下階層的服

²⁸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99), pp. 58

²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13.

³⁰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109.

裝、知識等等時，就是在確立階級之間的邊界，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維持。而這也就是作者閱讀他所屬的社會的方式。

第四章：A Police Inspector Sort His Files: The Anatomy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一個檢查警官的檔案分類：文人社會的剖析）

本章所使用的文本是 18 世紀巴黎一位負責書籍檢查的警官在 1748 到 1753 年間所寫的 500 份關於當時的書籍業以及作者的報告。這些報告使我們能夠對當時的文人（*gens de lettres*）及文壇（*republic of letters*）的運作方式及遊戲規則有所瞭解。在 18 世紀的巴黎，文壇運作的方式和今天相當不同。在當時文人還尚未被視作一種職業或身份，因為靠寫作為生的人才正要開始形成一種社會類別。只有極少數人，例如狄德羅，能完全靠寫作的收入為生。不過，寫作雖然不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職業或身份，但起碼這位警官對做為一種藝術的文學表示尊重。³¹

此外，這位警官記錄檔案的方式顯然和現代意義的檔案相當的不同。他在記錄這些文人的同時也加入自己對該文人及其作品的意見，例如依據顛像學（*physiognomy*）³²評論文人長相的好壞，或評論某位文人擅長散文而不擅長韻文等，而同時吾人也可由這些意見的表達一窺其對文學的品味。這種結合文學的感性與官僚式的一絲不苟的檔案在今天的警方來說是難以想像的。而他評論的角度往往出於自身的好惡，較不受其警方立場的影響。例如他在報告中對一位「不虔誠」，但是才華甚高的文人表示讚賞，而即便是惡名昭彰如伏爾泰，他至少也肯定其才能。他也對

³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75.

³² 一種偽科學（*pseudoscience*），類似中國的相面術。

一位因誹謗政府而被關入巴士底監獄（Bastille），最後潦倒死於街頭的文人的才華感到惋惜。事實上，被關入巴士底監獄是許多文人共同的經驗，因為當他們無法生活時往往靠寫作或販賣違禁書刊為生。³³巴士底監獄也成為許多反政府宣傳的象徵。例如Linguet和Mirabeau敘述自身遭到政府迫害以及在巴士底監獄中受苦的著作，在1780年代成功地將輿論導向反政府的一端。因此，雖然在大革命發生時巴士底監獄中僅有7名囚犯，³⁴但它仍成為群眾攻擊的目標。

透過這些報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18世紀巴黎文壇的模糊輪廓，文人們仍然散在社會各階層，尚未構成一個明確的職業身份。但警方已經察覺到文人對社會的影響力，這似乎代表人們已經開始潛在地意識到文人作為一種社會身份的概念，也就是說，人們的集體心態中，已經悄悄浮現了一個新的分類範疇（category），而這正是下一章所要討論的。

第五章：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edie*

（啟蒙哲士剪裁知識之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

人們總是以分類的範疇（category）來看世界，這使一切看起來有條理可循。這些範疇對每個人來說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們在人開始形成思想之前就被給定（given）了。正因為如此，這樣的一套分類範疇具有一種持續性的權威（staying power），並且具有武斷性。例如我們會毫不遲疑地將北京狗和大丹狗都看作是「狗」，也就是將它們放在「狗」這個分類範疇之中，即使北

³³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68.

³⁴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79.

京狗看來和貓比較接近而大丹狗看起來比較像小馬。這並不是說將這兩種狗歸為同一類是不恰當的，重點是我們總是以分類的範疇在看世界，若非如此，我們將無法在生活中理出秩序。因此，難以被歸類的事物如「象人」或「狼人」（wolf boy），便令人感到害怕。而公貓在西方³⁵或食火雞在新幾內亞則被認為具有儀式性價值。³⁶於是，分類的範疇的改變，就代表了一種秩序與權力的轉變，而這便是作者針對百科全書在本章中所要探討的。

「百科全書」（Encyclopedie）一般來說，可說是啟蒙時代的代表作。其內容所包含的理性的觀念、人類的進步、宗教的寬容等，都是百科全書學派學者們的重要學說。而這本書也被當成法國啟蒙運動思想最重要的集成。³⁷但在 18 世紀，這部書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如有一部同樣是「百科全書形式」的著作，篇幅多達 64 冊。而百科全書內容和一般的參考書一樣，也包含了以 A 到 Z 的字母順序編排的諸多駁雜的知識。這就不禁讓人好奇究竟百科全書為何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事實上，百科全書與之前的字典型的參考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改定了分類的範疇，企圖賦予世界新的秩序。³⁸

將事物或知識歸類其實是一種權力的運作，在知識之樹上和弱勢學門相關連的學科很可能會在藤蔓上枯萎。因此，分類範疇之間的界線是危險的，假如這些界線崩解，世界將陷入混亂。因

³⁵ 貓在歐洲一般被認為是一種女性的隱喻，因此公貓被認為具有神秘性，通常被想像成是魔鬼的化身。見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2.

³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93.

³⁷ J.H. Shennan 著、孫慈敏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106-107。

³⁸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95.

此，確立並守衛這些界線是很重要的。當狄德羅和達朗貝（d'Alembert）在編纂百科全書時，便是冒著觸犯禁忌的風險，因為他們重新給定了在知識的分類上已知與未知之間的界線，從而將許多以往被視為神聖的學問刪除。此外，狄德羅和達朗貝也宣稱它們的作品是對人類知識的秩序與連結（concatenation）的系統解釋，而不只是另一本按字母順序編排的字典或摘要。³⁹

在百科全書之前，知識之樹的形象已經在培根和 Ephraim Chambers 的著作中出現。然而，百科全書和之前的知識之樹的不同之處，在於在百科全書的知識之樹上，神學被放在離主幹遙遠的一個小分支上，而且和一連串可疑的項目如迷信、占卜和黑魔法放在一起。形式產生意義。在此，百科全書派哲士僅僅透過位置的安排便能傳達其欲告知讀者的意涵。⁴⁰

透過修剪培根的知識之樹，達朗貝將天啟（revelation）臣屬於知識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理性哲學之下。一切不符合感官經驗認識論的事物都被排除於知識的領域之外。於是傳統的正統宗教被歸類於不可知（unknowable）的領域，從而被排除在現代的知識世界之外。而啟蒙哲士則成為新的分類範疇界線的守護者。⁴¹

透過以哲學取代神學成為諸學科之首，從而將知識的掌控權由教士轉移到啟蒙哲士的手中，便是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⁴²這個策略的成功，使啟蒙哲士取得了崇高的歷史地位與主導知識的權力，雖然在第四章文本中的警官眼中，文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百科全書策略的成功，有賴於其讀者對其新觀念的接受。而

³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94.

⁴⁰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99-200.

⁴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09.

⁴²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09.

18 世紀的讀者群，便是作者在下一章所要討論的問題。

第六章：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讀者對盧梭的回信：浪漫感性的建構）

在本章一開始，評者有必要對「回信」這一詞彙的意義作澄清。作者的原文是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照理應該翻成回應。但由於這些回應是讀者讀了盧梭的書之後寫信向盧梭表示他們的感動與景仰。因此，這些回應都呈書信的形式，故直接翻成回信。為免被誤解成是盧梭寫信給讀者後讀者的回信，在此特做說明。

閱讀究竟使怎麼一回事？雖然我們每天都在閱讀，但閱讀本身似乎仍是個謎。我們對閱讀的經驗是如此之熟悉，應該能毫無困難的理解何謂閱讀。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無法得知他人閱讀的方式是否和我們一樣。而要瞭解 18 世紀的法國人如何閱讀書籍，便是要瞭解他們如何思考，也就是要瞭解他們之中那些能藉由印刷符號進行思想傳輸的人。而這便是 Robert Darnton 在本章中所要處理的問題。

本章所使用的文本是大革命前 20 年法國 La Rochelle 地方的一位貿易商（bourgeois of Old Regime）和瑞士的一家出版商（STN）之間的 47 封通信。這些信的特殊之處在於這位貿易商並不是在和出版商談生意，而他事實上也並不經營書籍貿易，他是以一个讀者的身份在談論他閱讀的情形。因此，透過這些通信我們可以描繪出一個模糊的 18 世紀讀者的輪廓。除此之外，Robert Darnton 也參考盧梭的小說「新愛露意絲」（*La Nouvelle Heloise*）的讀者對盧梭的回信。

在 18 世紀，書籍做為一種物體（physical object）和現代是十分不同的。當時的人了解（perceive）書籍形式的方式也和現代的人不一樣。在現代，一般人對於大量印刷、標準化的書籍或許不會太過講究，只要有一定的品質即可。但在 18 世紀法國，書本是手工製造的，每個工匠造書的技藝都有所不同，因此每一本書都是獨具特色，獨一無二的。當一位 18 世紀的讀者拿到一本書時，會先就其紙質、印刷、排版等細節作檢視，確認其品質，然後才開始閱讀。⁴³18 世紀的讀者不僅在書的形式上和現代人有不同的感受，他們閱讀的態度、閱讀的方式，在在都和現代不同，我們若想要對 18 世紀的人閱讀的方式有所了解，就必須探討一位對當時的閱讀大眾有極大影響力的作家對閱讀的看法，而這個作家就是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盧梭同時也是這位貿易商最喜愛的作家。他在信中稱呼盧梭為「吾友」（*l'Ami Jean Jacques*），雖然事實上他們從未見過面。

盧梭對閱讀的看法，可以從他的小說「新愛露意絲」中看出端倪。「新愛露意絲」是一本書信形式的小說，其情節都由一封封信所構成。在其中一封信中，男主角告訴女主角最好的閱讀的方式就是淺嘗一小段文字之後，在冥想中慢慢咀嚼，或和他人廣泛的討論。他認為：「這是消化它（文字）最徹底的方式。」而在盧梭的另一部作品艾彌兒（*Emile*）中也有類似的見解。當然，盧梭的影響力可不只及於小說中的人物。事實上，他還指導他的讀者如何閱讀。盧梭寫作的策略與以往的作家不同，他並不是隱身在敘述的背後操縱書中的角色，而是將自身投入書中，並期望他的讀者也這麼做。他轉變了作者與讀者、讀者與文本之

⁴³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24.

間的關係。

在「新愛露意絲」中，盧梭的寫作策略是假裝書中男女主角間的通信是兩個純潔靈魂的心靈交流，而他只是信的編輯者。但事實上，盧梭才是這些信真正的作者。因此，男女主角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是盧梭與讀者之間的交流。現代的讀者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這些通信的內容是真實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它們是盧梭的作品，但對 18 世紀盧梭作品的讀者來說，雖然他們其實知道這些信是盧梭的作品。但在閱讀的時候，他們真的相信這些作品的真實性，因為他們讀到了盧梭在書中所要傳達的訊息，那便是對美德的感動。在「新愛露意絲」的讀者對盧梭的回信中，每一個讀者都表示他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幾乎總是淚流不止，難以自抑。有一位讀者甚至提到閱讀這本書最好的方式就是鎖在房間裡，這樣流淚的過程才不會被打斷。對現代的讀者來說，18 世紀法國人這種閱讀方式是難以想像的，因為他們的心態和我們不同。⁴⁴這些回信中除了流淚之外，也伴隨著狂喜、悲嘆、瘋狂、折磨等字眼。雖然「新愛露意絲」是愛情故事，但這些讀者流淚的原因不是如現代的讀者一般受到書中男女主角愛情的感動。真正讓讀者感動，而流下美好的眼淚（delicious tears）的，是書中主角對美德的愛，而不是愛情本身。許多讀者認為盧梭本人必然經歷過書中人物的感受，所以才能如此真誠的在書中表現出來，因此他們不斷的寫信給盧梭，告訴盧梭他們確實在生活中感受到了這些情感。事實上，從讀者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盧梭在讀者的心目中已經被神化成一個具有超人美德的聖人，讀者們事實上相信書中人物的美德正是盧梭本人的美德。而讀者對書中的美德並不僅止於感受，

⁴⁴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52.

而是在生活中依照盧梭在書中的教誨身體力行。透過感受書中人物的美德，讀者在現實生活中也提升了自己的美德。

將自身投入書中，並將書中所言應用到生活之中，這便是 18 世紀法國人的閱讀方式。相同的言論也出現在另一本德文的閱讀指南中。這表示這種閱讀方式的流行在 18 世紀不只侷限於法國。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一種往浪漫主義過渡的文學以及閱讀方式已經在流行，這種潮流將影響到往後幾個世代的歐洲。

四

將各章的內容做過介紹之後，評者以下將先就作者所做出的幾點結論提出一些意見，最後再探討作者寫作本書的策略。

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是從農民的故事中去歸類出農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農民的世界觀。而作者歸納的結論大致有人口的壓力、食物的匱乏、生活環境的險惡、對長子繼承制的焦慮等等。在此，評者認為可以舉另一位史家和作者的方法作比較。

Natalie Davis 解讀 16 世紀法國赦罪檔案的方式和作者解讀童話故事文本的方式其實是一樣的。其方法是從不同的童話故事或赦罪檔案中歸納出相同的因素，然後去詮釋這些因素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可能具有的意義，目的是要探究當時人們的集體心態（collective mentalities）。就本章來說，食物在童話故事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童話故事中的主角往往以食物、衣服等維持生活的必需品作為其願望。⁴⁵這表示 18 世紀的農民生活在物資極端匱乏的世界中，⁴⁶透過以童話形式呈現的口傳歷史（oral tradition）故

⁴⁵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34.

⁴⁶ 有關 18 世紀法國農民生活的困境，見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28-29.

事來表達其對飽餐一頓的慾求。⁴⁷同樣地，故事中經常出現母親設計將不工作的家庭成員逐出家門的例子，顯示工作的必要性對維持生活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⁴⁸而在《檔案中的虛構》一書中，Natalie Davis 則是從赦罪檔案中歸納出可被社會接受的赦罪敘事策略的因素。就男性來說可被寬恕的犯罪因素通常是過失、心緒不寧⁴⁹、盛怒或酒醉。⁵⁰而帽子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⁵¹就女性來說，強調犯下殺人罪的原因是心靈與意志的脆弱⁵²或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調戲或侵犯，⁵³是較易受國王及法官青睞的敘事策略。在此，雖然兩位作者處理的文本及時代不同，但在呈現當時一般人對某些事情的共同看法，也就是一般人的心靈空間（mental universe）或集體心態的企圖上，卻是有志一同。這種研究取徑上的近似絕非巧合，而是因為兩人都受到人類學的影響。Natalie Davis 援引人類學家對文化的認識，嘗試結合歷史學和人類學，如 Victor Turner、Clifford Geertz 等等，都是她私淑的學侶。⁵⁴而作者則是在普林斯頓大學與 Clifford Geertz 共事，⁵⁵受啟發而採用人類

⁴⁷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33.

⁴⁸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33.

⁴⁹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92-93。

⁵⁰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頁 130-132。

⁵¹ 由文本來看，帽子對當時的性來說具有象徵男性尊嚴的意義。見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頁 133。

⁵²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頁 234。

⁵³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頁 253。

⁵⁴ 盧建榮，〈一位左翼、猶太裔女歷史家的奮鬥〉，收載 Natalie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頁 15。

⁵⁵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cknowledgement, pp. 78. 另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網站，Robert Darnton 教授訪談錄。

學的觀點，人類學者如瑪麗道格拉斯和李維史托等也是其學術的奧援。⁵⁶在性別的差異上，作者所分析的文本也顯示男性和女性故事中所具有因素的差異性。男性的故事通常是描述一個為追尋自己的命運而離家的兒子，在冒險的路途中受到好心精靈的幫助而獲得財富，最終得以迎娶地主的女兒。或一個農民在國王招親的競賽中獲得優勝而得以迎娶公主等等諸如此類的情節。而女性的故事則是農民母親設計將好吃懶做的女兒描述成是具有超人紡織能力以吸引國王的注意，從而實現其將好吃懶做者趕出家門的願望。而國王也作出只要女兒能夠達成母親所宣稱的紡織成果便要加以迎娶的承諾。結果在超自然力的幫助下女兒達成了成果，也嫁給了國王。⁵⁷就故事中的這類因素來說，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故事都顯示農民心靈深處集體無意識地對貧富主客易位（the poor turn the tables on the rich）及欺騙（outwit）大人物（the big）的渴望。

不過，評者的疑問是，有沒有可能農民的故事中其實隱含了一種對基督教的顛覆，也就是一種「不信」（disbelief）。例如在「魔法師的學徒」故事中，父母為什麼將孩子送給魔法師？當然，誠如作者所說，這很可能是反映了當時的人口壓力。但也有可能農民就是透過這種故事來反諷基督教的說法。為什麼是送給魔法師？為什麼不是送給上帝或聖徒？因祂們從未出現！而「死神教父」故事也如作者所言，表現了法國故事中特有的機智。但我們也可以問，為什麼選死神而不選上帝或聖徒當教父？答案或許也是：因祂們從未出現！而在許多故事中經常出現的，農民因

⁵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89.

⁵⁷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35.

為做了善事而被允諾願望的情節，作者認為農民不選擇上天堂而選擇飽餐一頓，正反映了農民生活中食物的匱乏。但我們難道不能懷疑，農民可能事實上壓根不信天堂這回事，所以以這種故事諷刺教會的說法。雖然作者並未提及，不過評者合理推測這些農民故事大致都有中古的淵源。如 Carlo Ginzburg 所指出的，他書中主角 Menocchio 的異端思想其實是傳承自一個有千年以上悠久傳統，在大眾口傳文化中代代相傳的唯物宇宙觀。⁵⁸因此，是否在法國中古農民的心靈深處，就已潛藏了對基督教的批判。當然，評者在此只是臆測，並無法說明這些說法有何根據。但對心態的解釋本來就很難有太多堅實的證據可言。因此，評者認為大膽的提出這些意見還是能對有關本書的討論有所幫助。

在第二章的文本中，評者認為工人們的象徵性的反叛其實和 E. P. Thompson 的「道德經濟」是屬於同一脈絡下的群眾行動，只不過此處只停留在象徵的層次。E. P. Thompson 認為 18 世紀的英國糧食暴動者相信他們採取暴力的集體行動是有正當性的，因為整體社群覺得，他們關於「公正的製造銷售慣例」的傳統價值，也就是「道德經濟」，已經被違背了。⁵⁹而對本章中反叛的印刷工來說，作坊主人對工人的剝削已經違背了「主人和工人們一同工作的平等關係」或「主人有照顧工人的義務」⁶⁰這樣的傳統價值。而他們的行動也符合嘉年華中「嘲弄音樂會」（charivari）的傳

⁵⁸ Carlo Ginzburg, *Cheese and Worm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7-58.

⁵⁹ 蘇珊·德山，〈E. P. 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社群、群眾與儀式〉，收錄於 Lynn Hunt 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93。

⁶⁰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8.

統，而其嘲弄的對象是被社群認為違反社會規範的人。⁶¹不過，此處的問題是，在「貓的大屠殺」這個文本中，「印刷工人作為一個社群」的說法究竟能不能成立，特別是在文本中所有的工人，不論是學徒或職工，都一致參與此一象徵性反叛。誠如蘇珊·德山對 E. P. Thompson 的質疑，「道德經濟」的模式無法說明為何在暴動之中有些人反對，有些人則未明言贊成。⁶²因此我們也可以質疑是否所有的印刷工人都立場一致。對此一質疑，評者認為，由於印刷工人有一種自我界定的強烈性格，將自身所屬的群體和其他的群體，如「偽善的」布爾喬亞（指作坊主人階級）或「喜好爭吵的」木匠與石匠⁶³區隔開來，再加上工人之間有嚴密的組織與行規，⁶⁴因此，若假設說他們在殺貓行動中立場一致應是可以成立的，特別是此種反叛只是象徵性的，並不需要付出實際的代價。不像實際的反叛會使社群重新界定自身，⁶⁵象徵性的反叛反而可以一再以嘉年華式的形式重演，而一再地加強對自身價值的認同。⁶⁶工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受到的壓迫透過象徵性的反叛而得以抒發，同時也顯示工人對自身困境的潛在焦慮。

而在有關第二章的評論中，Roger Chartier 質疑作者將殺貓行動視為嘉年華和嘲弄音樂會的合理性，因為在殺貓行動中並未出

⁶¹ Peter Burke 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頁 179。

⁶² 蘇珊·德山，〈E. P. 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社群、群眾與儀式〉，頁 94。

⁶³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89.

⁶⁴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85-86.

⁶⁵ 蘇珊·德山，〈E. P. 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社群、群眾與儀式〉，頁 104。

⁶⁶ 工人們在殺貓行動之後的日子裡將此行動以嘉年華的慶祝形式上演了至少 20 次。見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77.

現嘉年華的要素，也就是火。而工人們將貓審判後絞死的儀式也和節慶將貓投入火堆的傳統儀式不同。⁶⁷對此，評者認為，或許工人們是在殺貓行動中將嘉年華中的象徵加以挪用，也或許如 Roger Chartier 所認為的，這個行動可能是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信仰、儀式和行為，而和嘉年華無關。⁶⁸此外，Chartier 也質疑作者對象徵的解釋。他引用一本 18 世紀的法國字典來說明並非所有的符號都是有象徵意義的，也不像作者所說有一種象徵體系的存在。⁶⁹對此質疑，評者的看法是，即便作者對象徵的解釋有待商榷，但 Chartier 引用菁英編纂的字典來質疑作者對庶民文化中象徵的解釋似乎也並不恰當。不論如何，Chartier 的批評顯示了文本的延展性，以及對象徵作解釋的危險性。在對本章的其他評論中，段昌國認為工人透過象徵性反叛指控作坊主人為女巫的奸夫。⁷⁰而潘宗億則認為嘉年華的「審判」意義，使工人們可在其節慶活動中遂行對主人的審判。⁷¹但評者認為，依據嘉年華的意涵來看，工人們主要是諷刺主人戴綠帽。一方面是指控女主人與她的神父通姦，一方面透過反叛行動象徵性地強暴了女主人。主人並不是工人攻擊的主要目標。在嘉年華的意涵中，戴綠帽的丈夫（cuckold）是嘲弄音樂會諷刺的對象，雖然也有審判的意味，但以貓在嘉年華

⁶⁷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8-109.

⁶⁸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9.

⁶⁹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3.

⁷⁰ 段昌國著，《人間咖啡館：普大斜陽》見中時電子報，92 年 12 月 24 日。

⁷¹ 潘宗億著，〈Review of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頁 6。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⁷²來看，審判的對象事實上應是通姦的妻子，因為貓是女性的隱喻。因此，女主人是工人們首要的攻擊目標，而從文本看來也的確是如此。而工人們指控女主人為女巫主要是要強調她對主人的邪惡影響。在此，評者的疑問是，為什麼是女主人，而非主人成為工人們象徵性攻擊的主要目標？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她身為女人，卻能向工人們發號施令？本文前面已經有提到，工人們有著強烈的自我界定性格，並有嚴密的組織與行規，因此可以說是一個社群，或說是小社會。而在這個小社會中，女性是沒有地位的，兄弟情誼才是這個小社會的理想模式。若是用 Lynn Hunt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中的觀點來看，有沒有可能這份文本中的女主人也被工人兄弟們當成入侵公共領域的女性，所以才成為攻擊的焦點？Lynn Hunt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中，用家國互喻來探討家庭與國家中的兄弟父母之間的關係的轉變。她認為當時眾多的誹謗名人的文章（*libelles*）都是以皇后或國王的情婦為對象，⁷³代表一種男性對女性參與公共活動的領域的焦慮。因此，法國大革命時王后的處死代表著共和男性將為人母者從公共領域分離出去的企圖。⁷⁴而有沒有可能工人們在殺死小灰（*la grise*）時，其實是象徵性地殺死女主人，也就是象徵性地殺死入侵男性公共領域並對主人（印刷作坊之「首」）產生邪惡影響的壞女人？這一點作者並未提及。但果真

⁷²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0-92.

⁷³ 參見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第五章。Lynn Hunt 著；鄭明萱、陳瑛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第四章。

⁷⁴ Lynn Hunt 著；鄭明萱、陳瑛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頁 194。

如此，則 Lynn Hunt 所提到入侵公共領域的女人被共和兄弟侮辱並處以極刑的說法，⁷⁵在此似乎也得到印證，只不過此處是停留在象徵性的層次。若然，則 Lynn Hunt 所謂當時的心態，即兄弟聯手打倒父母重建家國的集體無意識，似乎也往下滲透到一般工人的層級，只不過工人們大多沒有提筆寫作的能力，不像菁英層級能為文攻擊知名的涉入公領域的女性，只能透過象徵性的反抗來表達其意涵。所以僅能就他們偶然遺留下來的文本來解讀其象徵意義。不過，Lynn Hunt 的論點是否可以套用在雇主與工人的關係上，仍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

另外，作者在本章中作者提到法國大革命時臨時人民法庭（popular tribunal）的無差別殺戮和工匠的暴動，似乎和在革命之前下階層象徵性的叛亂有某種關係。⁷⁶Mikhail Bakhtin 也認為庶民文化中暴動式的戲謔可能轉變為真正的暴動。⁷⁷但如 Gluckman 指出，習俗禁忌偶爾的撤銷反而有助於強化社會規範，而反叛乃是扮演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全閥角色。⁷⁸因此，我們或許也可以認為，正是由於象徵性的反叛有其運作的空間，真正的反叛反而不會發生。就像李維史托所說：「象徵性的滿足，……體現了人類恆久對於失序或顛覆秩序的慾望。顛倒社會秩序的儀式慶典之所以存在，不是因為那樣的狀態曾經存在過，而是因為日常生活永遠不會，也不能有任何改變。」⁷⁹但評者認為，由本章文本中的殺

⁷⁵ Lynn Hunt 著；鄭明萱、陳瑛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頁 191。

⁷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8.

⁷⁷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9.

⁷⁸ Peter Burke 著；江政寬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頁 213。

⁷⁹ 轉引自 Lynn Hunt 著；鄭明萱、陳瑛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頁 230-231。

貓行動來看，工人們並不是只有在嘉年華時才採取象徵性反叛的行動，而是一逮到機會就實行。由這點可以看出，嘉年華雖然有讓下層人民發洩對社會規範不滿的情緒的功能，但對這些工人們來說，顯然他們對作坊主人夫婦不義的憤怒（indignation）以及對「倒轉世界」的慾望，已經不能透過只在嘉年華時發洩來得到滿足。嘉年華慶典結束之時將 king of carnival（稻草假人）審判後燒掉（處死）的儀式，可說是象徵性反叛的終極形式，所以被當作慶典的壓軸節目。這也象徵下層人民對處死國王 / 國家⁸⁰的集體無意識。因此，當時機成熟之時，象徵性的反叛確實有可能轉變成為真正的反叛，畢竟 1793 年法國國王的確被審判並處死了。不過，所謂的「時機」，究竟指的是什麼？是外在的環境？抑或是內在的心態？或兩者皆是？在這一點上，答案似乎仍是模糊的。⁸¹

在第四章中，從文本中可以看出文人當時由政府的角度來看是沒有地位的。但在第五章中，作者寫到：「在 1750 年代的宣傳小冊（pamphlet）、戲劇、報紙和論文中，啟蒙哲士已經被認為是一個團體，與傳統及正統宗教的擁護者相對立。」⁸²評者的疑問是，這不就代表當時也有和警官不同的看法（心態）？但作者在

⁸⁰ 根據 Kantorowicz 的說法，英法兩國的君主都各自擁有兩個身軀，一個是會死的「肉身」（Body natural），另一個是不朽的「政身」（Body politic）。見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1957), pp. 11. 但在 1793 年，法國國王的兩個身體都被「處死」了，為什麼國王的不朽政身神話會破滅，則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或許就如 Lynn Hunt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和 Robert Darnton 在本書中所討論的，是一種心態的轉變。

⁸¹ 在 18 世紀中葉，國王在一般人民的心中已經不具神聖性，顯示一般人民的心態已經有所改變。參見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232、236-237;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86

⁸²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 pp. 208.

第四章中並未提及。而在第五章中，作者又寫到：「由於大多數啟蒙哲士都曾參與百科全書的編纂，以致於百科全書派學者和啟蒙哲士事實上成了同義詞。」而啟蒙哲士又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文人，或文人的代表。這就表示當時對文人的看法，至少有警官所認知的文人，媒體所認知的文人，與文人自己所認知的文人三種看法。若能夠對三者之間的關連加以探討，相信能對 18 世紀文人的生態及身份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可惜作者在這方面並未有所討論。

作者在第五章中指出，難以被固定地歸類在既有範疇中的事物，例如象人或食火雞，不是令人害怕就是具有儀式性價值。作者也舉了新幾內亞的民族作例子，顯然他認為他所說的分類範疇是可以適用在各民族的心靈空間的。但評者認為，對某些民族來說並非如此。假設我們完全贊同作者對分類的觀點，那麼蝙蝠這種既非哺乳類又非鳥類的動物就是令人害怕，或具有儀式性的。誠然，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是如此。但在中國，蝙蝠卻是福氣的象徵。而東非的波寇特族對陰陽人既不害怕也不認為其具有特殊的力量，而只是單純地將之視為殘障。⁸³顯然陰陽人對波寇特人來說是可以歸類的。評者並不是認為作者所說的分類範疇是不存在的，而是基於一種人類學的地方觀點的角度，對作者所列舉論述的例子的不足之處，提出一點意見。作者雖然提到其實分類具有武斷性，但他在書中所舉的例子似乎仍是西方人的觀點，未能深入說明異民族分類範疇之間的歧異性。

評者限於學力，在此只能就以上的諸項結論提出一點看法就

⁸³ Clifford Geertz, 〈常識乃一文化體系〉, 收錄於 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 《地方知識: 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 麥田出版社, 2002), 頁 119-120。

教於諸位方家。而以下將就作者寫作本書的企圖及策略加以評介。

五

在本書中，作者並未對書中的六個文本之間的關連性有明確的說明，或許作者的意圖就像百科全書派的認識論策略一般，單單透過順序的安排便能表達其意義。而這個意義，筆者認為正如潘宗億所言，是呈現了下層文化到菁英文化的過度。⁸⁴而有關作者在本書中的書寫策略的問題，評者將沿用 Roger Chartier 和潘宗億對此書的評論中的幾個重點來做進一步探討。

首先，是「法國性」的問題。潘氏在他對本書所寫的書評之中，提到作者在本書中的企圖是想要建立一個法國人的整體形象，也就是法國性。⁸⁵但評者認為，作者除了在第一章中企圖從農民故事中得出法國性之外，在其他各章中並未有此企圖。確實，作者在本書開頭即開宗明義表示本書是要探究 18 世紀法國人的思維方式。但由作者的行文來看，與其說他是在追求法國性，不如說他是以法國為例來探討在 18 世紀至少在中西歐出現的幾項重大的轉變，例如中產階級的出現和閱讀方式的改變等。即便這些轉變是源出法國的，也不代表作者企圖由對這些轉變的探討來建構法國性。例如在第六章中作者也舉出一本德文的閱讀指南來說明其實訴諸情感的閱讀方式在德意志地區也是一種風潮。而在第五章中他認為百科全書認識論策略的成功，使啟蒙哲士在歷史上取

⁸⁴ 潘宗億著，〈Review of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頁 1。

⁸⁵ 潘宗億著，〈Review of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頁 2。

得優越的地位。而很明顯的，所謂的成功，指的是這種策略，或說是這種新的世界觀，在歐洲被普遍的接受。如此一來，又哪裡有所謂的法國性？何況，Robert Darnton 在第一章中論證農民的故事中的法國性的方式，是透過語言以及諺語來論證法語中獨特的邏輯和農民故事中所表現出的心態有關。⁸⁶因此，只有這一章有可能可以討論法國性的問題。然而，正如 Roger Chartier 所質疑的，既然作者在書中不斷的強調現代人和過去的人的思維方式之間的不同，那麼 18 世紀法國農民的思維方式又怎能在現代依然存在？而若此思維方式真的存在於現代法國人的思考脈絡之中，則現代法國人和過去法國人之間思維方式的差異或許不如作者所強調的那樣的大。⁸⁷

再來，就是代表性的問題。潘氏在其文章中質疑究竟作者所使用的文本的意義是真實的，或是虛構的？是普遍性的，或是地方性的？⁸⁸在此，評者希望由兩個面向來探討此一問題。第一個，是文本用以探究心態的代表性。第二個，是由文本所探究出的心態在地域上的代表性。就第一個面向來說，潘氏質疑若文本中所描述的行為實際上並未發生，則作者所得出的結論又如何能夠合理？對此，評者認為文本中所載之事實是否發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文本確實是 18 世紀的法國人所撰述的，因此透過對其中的象徵符號的解碼，吾人可以一窺文本作者的思維方式。若一定要是「真實」的文本才能用以研究，則本書第一章研究的農民

⁸⁶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61、65.

⁸⁷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1.

⁸⁸ 潘宗德著，〈Review of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頁 8。

故事難道是真有其事？重點不在於文本所載的真實性，因為文本本來就是虛構或虛構與事實參半的。況且作者在本書中所選用的文本，第二章是一個印刷工的回憶，⁸⁹第三章是旅遊指南，第四章是政府檔案，第六章是信件。正如作者所說的，這些文本的「真實性」本來就不低。⁹⁰重點在於文本是「過去的人」所撰述的，而作者在書中所持續不斷強調的一個重點是，文本的作者也和他同時代的人分享同樣的思維方式。⁹¹因此透過對文本的解碼，吾人便可探究 18 世紀法國人的思維方式。但此處的疑問是，正如 Roger Chartier 所質疑的，單只透過寥寥數份文本便企圖探究當時的人的思維方式，證據是否足夠？⁹²其實這正是心態史研究的一個問題，由於能解讀出象徵意義的文本難得，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往往只能就有限的證據來做推測。這確實是心態史研究的一個侷限。不過，Roger Chartier 在探討大革命之前國王的象徵意涵時，引用 Mercier 的一段記述來說明國王的象徵物對當時的人來說並不具神聖性。⁹³這似乎就落入了他自己批評 Robert Darnton 問題的謬誤之中。

而有關第二個面向，由於法國是個地域性相當強的國家，因

⁸⁹ Roger Chartier 對於第二章文本的來源有所質疑，不過評者限於學力，無法對此做評論。見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105-107.

⁹⁰ 例如第三章的旅遊指南，作者認為它是非虛構的 (nonfiction)。而第六章的信件，由於「新愛露意絲」一書在 18 世紀的法國極為暢銷，在 1800 之前就出了至少 70 個版本，因此代表性也是有可信度的。見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07、242.

⁹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173.

⁹²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pp. 99.

⁹³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86.

此若是以一個地方的文本來探究整個法國的心態，確實是有待商榷的。但筆者認為，除了第一章外，作者並未企圖以其文本來代表整個法國人的心態，而是將是將文本納入整個法國，或歐洲的脈絡來討論，當作是在 18 世紀發生的幾個重要的潮流或轉變的個案研究以佐證之。例如以第二章來說，作者是將該文本放在前近代歐洲流行的虐貓殺貓娛樂，⁹⁴以及嘉年華的傳統脈絡中來討論，探討工人殺貓行動在傳統中的象徵意涵以及這些象徵意涵與當時現實環境的關連。第三章則是將該文本放在 18 世紀法國的中產階級 (*bourgeois of Old Regime*) 地位日漸重要的脈絡中來討論。第四章和第五章則是為文人 (*gens de lettres*) 在當時的地位和身份提供政府和文人自身兩種觀點，將此放在文人，也就是以寫作為職業的人，在 18 世紀的法國日趨重要的這個脈絡中討論。而第六章則是將作為文本的信件，放在 18 世紀在歐洲蔚為風潮的，訴諸浪漫感性的盧梭式閱讀的脈絡中來探討。因此，很明顯的，作者並不是以一個地方的文本來代表整體法國或歐洲的心態，而是將之作為 18 世紀影響歐洲的幾個大潮流在法國發生的佐證。

最後，有關菁英文化與俗文化之間的關係，評者在前面已經探討過，農民的故事其實也有可能是對基督教教義的顛覆，而工人殺貓的行動若是放在嘉年華的脈絡中來看，其實反映的是象徵性反叛的運作。而象徵性反叛和法國大革命之間，其實可能有某種關連。因此，我們不應該低估庶民文化對菁英文化的影響。如啟蒙哲士批判基督教的思想 and 農民的故事之間有沒有可能有什麼關連？而嘉年華中象徵性地審判並處死國王的悠久傳統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仍是模糊的。而

⁹⁴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pp. 90-92.

菁英文化對庶民文化的影響也同樣不該被低估。從第六章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盧梭的作品如何風靡了眾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不盡然都是菁英份子，至少也包括了上層的工匠和店主。⁹⁵因此我們也不應低估菁英的著作對庶民的影響力。而如拉伯雷的著作也顯示了菁英文化和庶民文化的融合。⁹⁶以上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評者限於學力，只能就此提出一點意見，希望能對有關這本書的討論有所幫助。

⁹⁵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71;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69-70.

⁹⁶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 203.; 18世紀的知名作家也常挪用庶民文學。見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81.